

迁移模式对农民工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研究

梁辉¹, 胡健², 杨云彦³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口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3; 2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3 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利用 2011 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研究迁移模式对农民工重构人际网络的影响。迁移意愿在迁移模式影响人际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 迁移距离和迁移规模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负影响, 迁移时间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正影响; 农民工在初级人际网络建立阶段群体差异不大, 呈现“内卷性”群体特征, 迁移距离和迁移时间都不显著, 而在新型人际网络构建阶段群体差异显现, 三种迁移模式均显著, 构成新型人际网络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等显著影响人际网络的构建。

关键词: 迁移模式; 人际网络; 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1668(2014) 02 - 0044 - 09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2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 26261 万人, 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3.9%。其中, 外出农民工 16366 万人, 增长 3.0%; 本地农民工 9925 万人, 增长 5.4%^①。从总体上看, 我国农民工的迁移规模逐渐壮大, 迁移模式也有了较大改变。迁移形态, 从个人迁移转变为家庭迁移、从“钟摆式”的暂时迁移转变为定居为目标的永久迁移; 迁移的地域选择, 从“单向梯度东移”到东强西弱的非对称“双向”迁移转变; 迁移信息的搜寻, 从口耳相传的连带式迁移到依赖信息技术的主动搜寻式迁移; 迁移决策, 从计划式迁移到理性自主式迁移等。这些模式的转变源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变革、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等, 深刻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与进程并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基于“农民工迁移模式变迁”以及“信息社会下信息技术向中下阶层扩展”两个背景, 研究在信息社会中农民工不同的迁移模式是如何影响其人际网络构建的, 内在机理以及影响程度。

2 农民工迁移模式与人际网络构建的理论分析

2.1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演变

2.1.1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界定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看, 专家学者根据各自的学科背景与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模式划分。

按照农民工是否打算永久居留和城市, 将人口迁移模式划分为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移。两者具体可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注: 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 6 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 6 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收稿日期: 2013 - 05 - 27; 修订日期: 2013 - 11 - 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转型期农民工能力发展与城市融合”(编号: 71173240) 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信息技术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重构的影响研究”(编号: 11YJC84002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辉(1979—),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信息经济与人口迁移; 胡健(1990—), 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以通过是否在城市买房、家庭或个人的年净收益大小、外出时间长短以及是否举家迁移且愿意留城等指标进行划分(杨肖丽、景再方,2010)。另外,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即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从行为层面分析,可以分为行为性的永久迁移和非永久迁移;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分为制度性的永久迁移和非永久迁移。判断农民的迁移是行为性的永久迁移还是制度性的永久迁移,主要依据农民工是否实现了户籍迁移,即农民工是否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蔡禾、王进,2007)。关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留特点和动态模式,有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留时间越长,其会“不断沉淀”、“逐步沉淀”,从而发生永久迁移的可能性越高,即“居留决定居留”(任远,2006)。

按照农民工家庭成员迁移人数的多少,将迁移模式分为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个人迁移是指农民工独自一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家庭迁移则可定义为携带配偶、子女、父母及其他亲属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唐震、张玉洁,2009)。其中,家庭迁移模式涉及情况较多,相对比较复杂,具体可分为单身(未婚)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五种(李强,1996)。按朱明芬(2009)的观点,则可将家庭人口迁移模式归为单人独行、兄弟姐妹同行、父(母)子(女)同行、夫妻同行、夫妻携子女同行、夫妻父母子女同行和其它7种模式。

按照农民工流动范围,将迁移模式分为跨省迁移、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三种模式。有的学者也将其简单分为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两种迁移模式。当人口迁移跨越国境时,一般可以简单划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群体划分方式。如有学者基于职业搜寻理论,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分为边在家务农边寻找异地工作和先转移到异地再寻找工作两种方式(钱永坤,2006)。也有学者按户口登记地是否改变,将人口迁移划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正式迁移(杨云彦,2004)。也可根据人口迁移是否受制度、法律、政府计划等限制,将迁移模式分为自由迁移和计划性迁移等。

本文将从迁移规模、迁移时间、迁移距离三个侧面分析农民工迁移行为的变化,分别对应着“家庭/个人迁移模式”、“永久/暂时迁移模式”和“省际/省内迁移模式”。

2.1.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移模式的演化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在社会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迁入城市,我国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农民工的迁移模式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迁移模式日渐复杂化和多元化。从掌握的文献看,虽对现阶段农民工何种迁移模式占主导地位方面尚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关于迁移的演变趋势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

在迁移规模选择上,大多学者认为农民工经历了从个人迁移到家庭迁移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难以维持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定居生活,故我国农民工的迁移仍将以暂时性的个人迁移为主(马九杰、孟凡友,2003;张玉洁等,2006)。也有学者认为,在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的迁移主要以家庭迁移模式为主,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周皓,2004;洪小良,2007;朱明芬,2009)。

在迁移时间选择上,农民工群体呈现出永久迁移意愿越来越强的特点,这从不同时间发表论文的结论可以显现。侯红娅等(2003)通过全国性的调查,发现约有46%的农民工愿意永久性居住在城市;李兴华(2007)在湖南的实地调查,显示愿意安家在城市农民工约有63%;从李强等(2009)的课题调研数据中可以发现“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约占被调查农民工的一半;2011年的一项数据则显示9成的农民工愿意永久居留城市。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民工选择永久性迁移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在迁移距离的选择上,省际迁移比重越来越大,并呈长期增长趋势。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00年选择省际迁移的人数占总迁移人数的26.67%,2010年其比重则达到了32.56%。

2.2 农民工迁移模式与人际网络构建: 一个理论框架

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离开了流出地乡村基层政府的管理,又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关照”,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断裂,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农民工为了生存和生计的需要,

就必须不断寻求社会支持,重建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然而,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政府组织的低效、人群间的“歧视”、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的差距,都成为他们在城市构建新型人际网络的障碍。农民工求职信息传播不畅、上升通道闭塞,进而阻碍了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2.2.1 省际/省内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般来说,迁移距离越远的农民工,远离了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为构建其社会网络,会更积极利用自己的职业人脉关系、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如微博、QQ、微信等)及兴趣爱好交流网等资源与城市市民、异地同事、老板等进行沟通和交流,以拥有广泛的城市信息渠道,在城市中建立一种以业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而省内迁移的农民工距离原籍地较近,能够经常与亲朋好友相聚,同时对于迁入地的本地人来说,其省内迁移的农民工也都算是老乡,可以从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精神安慰及求职信息等,他们很少会主动去改变已有的人际网络。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迁移距离对其人际网络从血缘、地缘到业缘、趣缘的拓展起负面影响作用。

2.2.2 家庭/个人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方面,家庭迁移不利于人际网络的拓展。一般认为,家庭功能分化程度影响农民工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人际交往选择。通常,家庭功能分化越低,意味着从家庭内部可能得到的支援越多,寻求支援的人际交往更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反之则越依赖于家庭外部而寻求社会支援(蔡禾等,1997)。选择家庭迁移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可以得到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照和支持,孤独感等情绪相对较少,更容易局限于原有以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网络中。

另一方面,家庭迁移也有促使其拓展人际网络的动力存在。家庭迁移者为了整个家庭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稳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服务,有可能会通过职业关系、所在居住区域的地理位置关系、参与城市各类社会活动等途径,和城市市民、其他外地农民工、同事或有相同兴趣的本地人交流。从这一方面讲,家庭迁移者凭借其较多的迁移人数优势,更易于构建较为广泛的、成员较多的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迁移规模对人际网络的拓展具有正向和反向双方面的影响。

2.2.3 永久/暂时迁移模式下的人际网络构建

一般来说,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识和适应性增强,对城市里的其他群体也从陌生到逐渐熟悉,这些促进了他对城市信任感的加强,社会网络实现拓展。

较之于永久迁移,选择暂时迁移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只是单纯地务工经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回到原籍地生活、工作,因此暂时迁移的农民工很少有意愿去扩展城市中的人脉关系和社会交流网。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迁移时间有助于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拓展。

3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借鉴相关文献资料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农民工的人口迁移划分成三种迁移模式:(1)按迁移距离,将农民工迁移模式分为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2)按迁移时间以及是否打算长期居住,分为永久迁移和暂时迁移,即如果流入迁入地时间在3年及以上并且愿意融入本地并成为其中一员则为永久迁移,其他则归为暂时迁移;(3)按迁移人数,分为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即如果农民工一个人独自出来务工经商等则为个人迁移,携带配偶、子女等则为家庭迁移^①。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样本总数为128000份,其中16839份样本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本文剔除了这16839份数据,故

^①为方便研究,本文将不对家庭迁移模式具体划分

有效样本数据为 111161 份^①。

表 1 解释变量赋值表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迁移模式(MP1)	1 = 省际迁移; 0 = 省内迁移
迁移模式(MP2)	1 = 家庭迁移; 0 = 个人迁移
迁移模式(MP3)	1 = 永久迁移; 0 = 暂时迁移
就业身份(ES)	1 = 雇主; 2 = 自营者; 3 = 家庭帮工; 4 = 雇员
居住方式(LM)	1 = 散居; 0 = 聚居
性别(G)	1 = 男; 0 = 女
年龄(A)	岁
婚姻状况(MS)	1 = 已婚; 0 = 未婚
受教育程度(ED)	1 = 文盲; 2 = 小学; 3 = 中学; 4 = 大中专; 5 = 本科及以上

注: 由于 2011 年流动人口数据中年龄的数据为具体年月, 故此处年龄是按 2011 年估算的年龄, 而非准确的周岁年龄。

很少与人交往(很少与人来往) 。

表 2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划分及其比重

迁移模式	%
按迁移时间及意愿划分	
永久迁移	49.2
暂时迁移	50.8
按迁移范围划分	
省际迁移	70.8
省内迁移	29.2
按家庭迁移人数划分	
家庭迁移	67.7
个人迁移	32.3

注: 总人数为 111161 人。永久迁移共 54637 人, 暂时迁移共 56524 人; 省际迁移共 78662 人, 省内迁移共 32499 人; 家庭迁移共 75270 人, 个人迁移共 35891 人。

MP₃、ES、LM、G、A、ED、MS 等 13 个变量。具体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述如下:

$$(1) \text{Logit}(IN) = \ln \left[\frac{IN}{1 - IN} \right] = \alpha_0 + \alpha_1 MP_1 + \alpha_2 MP_2 + \alpha_3 MP_3 + \alpha_4 ES + \alpha_5 LM + \alpha_6 G + \alpha_7 A + \alpha_8 MS + \alpha_9 ED + \mu$$

$$(2) \text{Logit}(IN_2) = \ln \left[\frac{IN_2}{1 - IN_2} \right] = \beta_0 + \beta_1 MP_1 + \beta_2 ES_2 + \beta_3 LM_2 + \beta_4 G_2 + \beta_5 A_2 + \beta_6 MS_2 + \beta_7 ED_2 + \mu_2$$

$$(3) \text{Logit}(IN_3) = \ln \left[\frac{IN_3}{1 - IN_3} \right] = \gamma_0 + \gamma_1 MP_2 + \gamma_2 ES_3 + \gamma_3 LM_3 + \gamma_4 G_3 + \gamma_5 A_3 + \gamma_6 MS_3 + \gamma_7 ED_3 + \mu_3$$

$$(4) \text{Logit}(IN_4) = \ln \left[\frac{IN_4}{1 - IN_4} \right] = \delta_0 + \delta_1 MP_3 + \delta_2 ES_4 + \delta_3 LM_4 + \delta_4 G_4 + \delta_5 A_4 + \delta_6 MS_4 + \delta_7 ED_4 + \mu_4$$

上述公式中, α 、 β 、 γ 、 δ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α_0 、 β_0 、 γ_0 、 δ_0 是截距项, μ 、 μ_2 、 μ_3 、 μ_4 是误差项。其中, 模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的迁移模式对农民工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 因此, 本文所需的主要变量包括人际网络、迁移模式(分三类)、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以及居住方式) 以及三类交叉变量。

因变量为人际网络(I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并通过“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这一项数据来测度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情况。本文将农民工人际网络分为 3 种类型: 3 =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其他本地人 + 其他外地人); 2 =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户籍人口同乡 + 流入人口同乡); 1 =

自变量主要有 5 大变量: (1) 迁移模式变量。本文将迁移模式变量(MP, Migration Patterns) 共划分为省际、省内迁移(MP₁); 家庭、个人迁移(MP₂); 永久、暂时迁移(MP₃) 三类。如果发生省际迁移、家庭迁移、永久迁移, 则 MP₁、MP₂、MP₃ 这三个变量分别赋值为“1”; 反之, 则赋值为“0”。(2) 个人特征变量: 就业身份(ES, Employment Status)、居住状况(LM, Living Mode)、性别(G, Gender)、年龄(A, Age)、婚姻状况(MS, Marital Status) 和受教育程度(ED, Education Degree)。具体解释变量的设置和解释见表 1(解释变量赋值表)。

3.2 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变量的分析, 可以得知被解释变量为分类变量, 解释变量中有连续变量、虚拟变量和分类变量等, 故本文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本文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为 IN, 解释变量包括 MP₁、MP₂、MP₃、MP₁*MP₃、MP₁*MP₂、MP₂*

①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类。其中, 婚姻状况中已婚为原数据的在婚、离婚和丧偶; 居住方式中散居为原数据的租住私房、借住房、自购房/自建房; 聚居为原数据的租住单位/雇主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就业场所、政府提供廉租房、其他非正规居所; 受教育程度中文盲为原数据的未上过学; 小学为原数据的小学; 中学为原数据的初中、高中; 大中专为原数据的中专、大学专科; 本科及以上为原数据的大学本科、研究生。

型(1)是一个总体模型,包括本文重点考察的省际迁移和省内迁移、永久迁移和暂时迁移与家庭迁移和个人迁移3个迁移模式变量,同时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其余模型分别就3个迁移模式变量进行考察,此外本文还将对考察省际永久、省际家庭以及家庭永久迁移模式(模型5-7,模型形式与上述模型一致),以更进一步了了解3种不同的迁移模式分别对农民工人际网络构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运用统计软件SPSS 20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3 模型估计

3.3.1 模型拟合信息及似然比检验

从模型(1)的拟合结果来看,当模型未引入解释变量时(只包含截距)-2的对数似然值为54469,引入解释变量后减少为49102,两者之差等于5367,自由度为28, $P < 0.001$,则拒绝原假设^①,表明至少有一个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认为该回归模型有效。与此类推,其余模型也皆有效。

此外,根据以上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在 $P =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各解释变量的结果极为显著。

3.3.2 回归结果

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经SPSS 20版计量统计软件运行处理,上述7个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1及表3-2所示。

表3-1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年龄	-.029***	-.027***	-.028***	-.027***	-.016***	-.013***	-.012***	-.012***
迁移模式(省际迁移/家庭迁移/永久迁移为参照组)								
省内迁移	.052	.052	-	-	.678***	.679***	-	-
个人迁移	.276***	-	.269***	-	.298***	-	.269***	-
暂时迁移	-.029	-	-	-.006	-.174***	-	-	-.155***
就业身份(雇员为参照组)								
雇主	.063	.045	.070	.049	.216***	.210***	.320***	.284***
自营者	-.228***	-.255***	-.219***	-.248***	-.043	-.062	.061	.021
家庭帮工	-.775***	-.814***	-.762***	-.803***	-.564***	-.601***	-.451***	-.498***
居住模式(散居为参照组)								
聚居	.123***	.168***	.121***	.169***	.166***	.203***	.142***	.202***
性别(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176***	-.178	-.176***	-.179***	-.079**	-.080**	-.076**	-.082**
婚姻状况(已婚为参照组)								
未婚	-.277***	-.094*	-.274***	-.089**	-.088	.089	-.061	.144**
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为参照组)								
文盲	.181	.171	.181	.177	-1.14***	-1.18***	-1.21	-1.18***
小学	.525***	.513***	.526***	.520***	-.941***	-.978***	-.977***	-.958***
中学	.694***	.686***	.697***	.695***	-.610***	-.639***	-.601***	-.582***
大中专	.452***	.451***	.458***	.461***	-.299***	-.312***	-.241**	-.228**
常数	2.92***	2.91***	2.90***	2.91***	2.80***	2.69***	2.76***	2.87***

注:①因变量“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和“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的参照组为“很少与人交往”;②*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3.3 结果分析

(1) 迁移距离(省际/省内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迁移距离对初级人际网络的构建影响不显著。与“很少与人交往”相比,省内迁移比省际迁移的农民工构建的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更多($B = 0.052$),影响不显著($\text{sig.} = 0.110$)。本文解释为省际迁移的农民工,迁移距离越远,越形成人际社会网络关系的“拖网效应”,即距离越远,原有人际网络关系越脆弱。

迁移距离对新型人际网络的构建

①原假设 H_0 : 模型(1)无效,拟合度差;备择假设 H_1 : 模型(1)有效。

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这说明农民工的人际网络构建还处于被动、初级为主的阶段。另外,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造成的,比如居住方式,根据统计结果,选择聚居的省际迁移农民工比省内迁移的农民工多 47.4%,绝对人数相差 14339 人,由于省际迁移的农民工较多是居住在单位房、工棚等场所,其人际交往对象大多也是居住在一起的老乡,当他遇到困难或者生活危机等情况时,也往往向居住在一起的老乡获得帮助,故这部分农民工的人际网络仍以地缘等为主,从而也缺少重构其原有人际网络的愿望与动机。

表 3-2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年龄	-.027***	-.028***	-.027***	-.009***	-.014***	-.011***
迁移模式(参照组分别为省际永久迁移/省际家庭迁移/家庭永久迁移)						
其他 1	.041	-	-	.255***	-	-
其他 2	-	.153***	-	-	.632***	-
其他 3	-	-	.056	-	-	-.061
就业身份(雇员为参照组)						
雇主	.049	.043	.056	.299***	.271***	.292***
自营者	-.249***	-.254***	-.242***	.028	.011	.026
家庭帮工	-.806***	-.814***	-.797***	-.500***	-.505***	-.498***
居住模式(散居为参照组)						
聚居	.165***	.150***	.161***	.174***	.113***	.195***
性别(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178***	-.177***	-.178***	-.077**	-.072**	-.080**
婚姻状况(已婚为参照组)						
未婚	-.098*	-.177***	-.108*	.087	-.208***	.142**
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为参照组)						
文盲	.168	.178	.169	-1.258***	-1.191***	-1.204***
小学	.510***	.517***	.514***	-1.026***	-.979***	-.979***
中学	.685***	.684***	.689***	-.648***	-.636***	-.600***
大中专	.452***	.446***	.458***	-.278**	-.290***	-.238**
常数	2.885***	2.896***	2.866***	2.602***	2.669***	2.803***

注:①因变量“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和“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的参照组为“很少与人交往”;②*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网络和社会关系网。

(4) 个人特征变量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以“很少与人交往”作为参照组,年龄、性别、居住方式等均对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较为显著(sig. 均为 0.05 以下),婚姻状况对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较为显著,但对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不显著(sig. 分别为 0.000、0.108)。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越能够在城市中建立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对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具有负向作用,且极为显著(B 均为负数,sig. 值均 0.001 及以下)。一般情况下,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也就越高。而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又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构建。同时,受教育水平高意味着其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交换将会进一步拓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的人际社会关系网。

相对于男性,女性对构建人际网络(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具

(2) 迁移规模(家庭/个人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迁移规模对初级和新型人际网络构建都起到显著负面作用。这印证了家庭分化程度对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家庭迁移模式的农民工由于主要家庭成员一起迁入城市,家庭功能分化程度较低,遇到困难等一般通过家庭成员内部解决,对人际网络依赖较小,对重构人际网络的意愿也较小。

(3) 迁移时间(永久/暂时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的影响

迁移时间对初级人际网络建立影响不显著,对新型人际网络构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永久迁移模式,暂时迁移模式对于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型人际网络的可能性更低。为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社会支持,适应城市生活和节奏,突破原有的人际网络,并进一步融入城市,选择永久迁移的农民工经常会主动地与城市中的同事、城市市民、拥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等交往、沟通,从而在城市中建立较为广泛的人际网络。

有反向影响(系数B为负),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一般男性是主导,进入城市之后,男性相对与女性能较快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并较快地与一起来打工的老乡、其他同事、城市市民等建立联系。

年龄与拓宽人际网络具有反向关系,其原因是因为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和活跃,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其社交活动、城市业余生活等途径、渠道也更加广泛,并进而更进一步扩宽其社会人际网络。

相比散居者,聚居对农民工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影响,且OR值大于1,说明聚居的农民工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概率与“很少与人交往”的概率之比,较散居的农民工的这一比值大1.131倍。另外,从回归结果来看,聚居也对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显著性水平,这与预期不符。

以已婚作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为未婚的农民工对构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及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均具有反向作用,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即已婚者较之于未婚者更能够扩展其人脉关系网。

最后,从就业身份对农民工人际网络的影响来看,随着就业身份的提升(从“家庭帮工”到“自营者”再到“雇主”),农民工的人际网络逐步得到了转变和提升(系数由负逐步变正)。

4 研究结论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农民工迁移模式划分为省际/省内迁移,家庭/个人迁移,永久/暂时迁移等三种迁移模式,并将人际网络分为“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以及“很少与人交往”。基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运用统计软件SPSS 20,分析研究农民工迁移模式对其人际网络构建的影响。

结果表明,迁移模式对农民工人际网络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影响:

(1) 迁移意愿在迁移模式影响人际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本文认为,不管是迁移距离、迁移规模还是迁移时间都是农民工在现阶段迁移的外在表现,而内在影响人际网络构建的是迁移意愿。这在本文的“迁移时间(永久/暂时迁移)”中得到印证,只有这一项模式是显著正向影响的,而永久迁移在本文中界定为迁移时间超过3年且愿意融入本地。

(2) 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不同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将人际网络的构建分为初级人际网络(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络)和新型人际网络(以业缘、趣缘为主的人际网络)两个阶段。首先,迁移模式对人际网络两个阶段的影响方向相同。迁移距离和迁移规模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负影响,迁移时间对两个阶段人际网络都产生正影响。其次,农民工在初级人际网络建立阶段群体差异不大,迁移距离和迁移时间都不显著;而在新型人际网络构建阶段群体差异显现,三种迁移模式均显著,构成新型人际网络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3) 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人际交往在初级阶段呈现“内卷性”。受教育程度这一控制变量在初级人际网络和新型人际网络两个阶段作用都是显著的,但影响方向不同。在初级人际网络的建立阶段,和“本科及以上”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中学、大中专的农民工构建的初级人际网络更多,这是和一般情况不相符的,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及农民工人际交往的群体“内卷性”。而在新型人际网络的建立阶段,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构建以业缘、趣缘为主人际网络的概率提高。这说明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新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作用。

(4) 农民工自身与城市交往的意愿与动力显著影响人际网络构建。这可以从居住方式上表现出来。居住方式为散居的农民工比聚居形式的农民工在初级和新型人际网络构建时都更积极,打破了其人际交往的“内卷性”,农民工不得不更积极主动地构建新的人际网络。这一点也在迁移时间(永久/暂时迁移模式)中得到印证。因此,通过住房等政策的出台提升农民工的交往意愿可以促进其城市融入。

(5) 就业身份的提升促进了人际网络的提升。按照本文对就业身份进行的等级划分,将农民工就业身

份提升的过程界定为: 从“家庭帮工”到“自营者”再到“雇主”。在“家庭帮工”阶段, 对两种人际网络都是显著的负影响; 在“自营者”阶段, 随着就业身份的提升, 对初级人际网络的构建虽然还是显著的负影响, 但负影响程度减小; 当就业身份提升为“雇主”时, 对人际网络的构建更多地表现在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型人际网络上, 且是正的显著影响。因此, 通过政策制定打通农民工的就业上升通道将会促进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参考文献:

- Zhao Yaohui.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 to -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3): 281 - 286.
- Hidalgo, Sickert. The Dynamics of a Mobile Phone Network [J].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8, (12): 3017 - 3024.
- Lambiotte et al. Geographical Dispers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J].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8, (17): 5317 - 5325.
- Yang K.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J].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008, (21): 65 - 72.
- 唐震、张玉洁.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 (4): 4 - 10.
- 周皓.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4, (4): 60 - 69.
- 洪小良.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6): 42 - 50.
- 朱明芬. 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N]. *中国人口报*, 2009 - 06 - 15(003).
- 钱永坤. 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5): 60 - 68.
- 张玉洁、唐震、李倩. 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分析 [J]. *农村经济*, 2006, (10): 62 - 65.
- 侯红娅, 杨晶, 李子奈.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 [J]. *经济问题*, 2004, (7): 52 - 54.
- 李兴华, 戴健华, 曾福生. 湖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分析及对策选择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07, (6): 32 - 36.
- 黄乾.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4): 21 - 27.
- 李强, 龙文进.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2): 46 - 54.
- 郭少峰. 数据显示 9 成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 [N]. *新京报*, 2011 - 10 - 31.
- 邱林川. 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 [J].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6.
- 杨善华、朱伟志. 手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6, (2): 168 - 173.
- 樊佩佩. 从传播技术到生产工具的演变——一项有关中低收入群体手机使用的社会学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 (1): 82 - 85.
- 陈韵博. 新一代农民工使用 QQ 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10, (8): 80 - 85.
- 杨肖丽, 景再方. 不同迁移模式下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差异研究——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J]. *经济问题*, 2010, (8): 74 - 80.
-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61 - 179.
- 朱明芬. 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2): 67 - 76.
- 马九杰, 孟凡友. 农民工迁移非持久性的影响因素——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J]. *改革*, 2003, (4): 77 - 86.
- 丁未, 宋晨. 在路上: 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 [J]. *现代传播*, 2010, (9): 95 - 100.
- 雷蔚真. 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 (2): 88 - 98.
- 丁未, 田阡. 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研究 [J].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2008: 419 - 439.
- 杨英新. 网络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的现状与问题 [J]. *农业经济*, 2012, (4): 55 - 56.
- 高洪.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基于经济管理学研究 [J]. *复旦大学*, 2003.
-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J]. *社会学研究*, 1996, (4): 42 - 52.

- 朱虹.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手机社会功能的演变——基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调查分析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1, (3): 42-50.
- 文一篇. 不同居住模式下农民工的信息接触与城市融入状况研究 [D]. 中南大学, 2011.
- 郑思齐, 廖俊平, 任荣荣, 曹洋. 农民工的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1, (2): 73-86.
- 蔡禾, 叶保强, 邝子文, 卓惠兴. 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 [J]. 社会学研究, 1997, (6): 8-15.
- 贺寨平. 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 (1): 76-82.
- 周葆华, 吕舒宁.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 [J]. 新闻大学, 2011, (2): 145-150.
- 周云, 彭光芒. 人际传播中的信息交换与利益实现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05, (4): 18-21.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formatio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LIANG Hui¹, HU Jian², YANG Yun-yan³

(1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ttee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sampling survey data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1 and utilizing the model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The research results manifest that, firstly, the willingness to migrat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ffecting interpersonal networks by migration patterns; In addition, migration distance and migration scale bot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wo stages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the migration time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two stages. Thirdly,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among the rural migra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interpersonal network, which presents “involution” in the group, and both distance and migration time i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 of rural mig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terpersonal network, all of the three migration patterns are significant,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discrepancy of new interpersonal network. Fourthly, education degre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o o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Key words: migration pattern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rural migrants

责任编辑: 庞丽华